



中国商业史学会丛书

中国古代  
对外贸易史研究

(第一辑)

夏秀瑞 著

海洋出版社



#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历史丛书》

## 编辑委员会

主任：罗东明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璐 王佑明 王桂五 王相钦

宁 可 刘志宽 陈大鹤 陈以恕

李世俊 何善吉 吴 慧 郑学檬

张海鹏 夏秀瑞 徐艺圃 贾履让

程雨村

# 总 序

中国商业史学会组织编写一套《中国商业史学会丛书》，要我在这套丛书作一个总序言，借此谈谈我的看法。

中国商业史是一门新兴学科，成立学会的目的就在于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与繁荣。作为商业文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需要认真探索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规律，弘扬中华文化遗产，并和当代文化相结合，加强商业工作的理论指导。我建议要用“务实”和“求新”的精神来办好商业史学会，通过开展学术研究，积累资料，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提供借鉴，更好地为实际工作服务。要对古代、近代到建国以来商业工作发展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

为了给院校教师、科研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研究商业史（包括商业志）的同志提供发表成果的机会，给各方面需要了解、学习商业史的同志提供可以选用教材、读物和参考资料，学会在成立之后，即有编辑、出版一套丛书之议，我表示大力支持，希望早日圆满实现。

学会面向社会，为多种对象服务，读者是多层次的。一是搞好教材，为大中院校的师生服务；二是搞好普及工作，为广大商业干部职工提高历史文化修养服务；三是搞好科学研究和业务咨询，为这一学科的教员、研究人员以及有关业务部门的工作服务。

办学会要多办实事，讲求实效。编书工作做好了，就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实事。希望通过学会中有商业史研究素养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不断提出有新意的、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充实、丰富丛书的内容，为繁荣学科，培养人才，服务现实作出贡献。

丛书的编写出版是一项繁重的组织工作，需要缜密确定选题计划，妥善配置编写力量，为保证丛书的质量，学会特聘请本行著名专家和有关领导同志组成编委会，负责各书的编辑审定，力争水平高一些，品种多一些。如果这套丛书能对学校教学、职工自学、学术研究、业务咨询起些作用，能对当代商业史和地方商业志的编纂工作有些帮助，那就收到应有的社会效益了。

中国商业史学会名誉会长 **胡平**

## 前 言

中国对外贸易史是中国商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收录的论文，是我近年来在研究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方面的部分作品。除《古代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贸易关系》一文摘要发表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外，其余均为首次发表。

《古代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贸易关系》一文，是系统地论述两国贸易关系的历史，对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两国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发挥积极的舆论作用。其余几篇多反映唐朝海外贸易的方方面面，诸如：主要贸易国家，主要贸易港口，以及促进唐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因素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其物质文明的进步不仅在古代中国璀璨辉煌，在古代世界上也负有盛名。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唐代的中国是世界科学与文明的灯塔。唐代的强盛、富足和进步，吸引了周围的国家，致使唐朝同外国的政治交往，贸易往来，经济和文化交流均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在贸易往来方面，尤其是海路贸易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该书的出版，正是使读者了解这一点。唐代的海外贸易之所以得到空前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唐朝政府推行的开放政策。它不仅为唐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也对今天有着借鉴作用。这也是该书出版的意图所在。

与此同时，该书还为高等院校中国对外贸易史的教学提

供参考，并为有关的研究工作者的学术交流抛砖引玉。

限于水平，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师长、同行和广大读者惠予指正。

作者

1993年7月于北京

# 目 录

- 古代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贸易关系……………( 1 )
  - 一、交往的开端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国贸易关系的继续发展
  - 三、唐宋时期两国贸易关系的蓬勃发展
  - 四、元、明、清(前期)两国贸易关系的特点
  - 五、中国同印尼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 六、中国移民促进了印尼经济和贸易的发展
  - 七、通过贸易关系增进了彼此的友谊
- 浅析唐代海外贸易发展的诸因素……………( 37 )
  - 一、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
  - 二、造船和航海业的进步
  - 三、佛教的传播
  - 四、唐朝政府开放政策的推行
- 唐代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 59 )
  - 一、唐代同东亚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
  - 二、唐代同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
  - 三、唐代同西亚、非洲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
- 唐宋时期明州港的海外贸易……………( 87 )
  - 一、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确立
  - 二、海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
  - 三、进出港商品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 四、促进海外贸易发展的因素

唐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及其管理……………(109)

一、航道的畅通

二、商船和商货的云集

三、外商的活跃

四、始设海外贸易管理制度

附录……………(127)

附录一、遣唐使一览表

附录二、日唐间往来船舶一览表

附录三、波斯与唐通使

附录四、大食与唐通使



# 古代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 友好贸易关系

古代中国同群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远古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上，便可以寻觅到古代中国的器物。确切的古籍和地下发掘的汉代陶器表明，两国的交往认定在公元前后，实属无疑。从此，随着两国间交通的畅达和交往的开展，逐渐建立了历代的友好贸易关系。它象纽带和桥梁，实现了两国间的有无互济，并促进了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各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大有裨益。由商人为先导的大量华人移居印度尼西亚，对其经济的开发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漫长的贸易往来中，所凝结的传统情谊，更是人们传颂的佳话。

## 一、交往的开端

中国同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两国的接触，究竟始于何时？印尼考古发现的四方形石斧、青铜器和铁制工具，似乎告诉人们，早在远古时代，两国就有了交往。然而，这些是通过何种渠道到达印尼的呢？迄今，尚无从稽考。本文拟从有文字可考的汉代为起始点。

公元前2世纪，西汉武帝时期开辟的中印航线，已为中国和印尼两国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性。而从印尼出土的汉代陶器，却为此提供了确凿的依据。苏门答腊出土的中国陶器

中，有刻有相当于公元前45年的年号；有刻绘穿着中国服饰的人物和汉代式样的马匹的图案<sup>(1)</sup>。1936年，在西爪哇万丹的古墓中发现了汉代的陶器，该陶器同中国汉墓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sup>(2)</sup>。但两国间交往的文字记载，却始于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东汉顺帝永建六年（132年），作为印尼领土组成部分的古叶调国，曾遣使携礼物来华通好。《后汉书·孝顺纪》记载：“（永建六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sup>(3)</sup>《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称：“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sup>(4)</sup>汉顺帝因其远道而来，礼迁优厚，赠予贵重礼品。据中外学者考证，该叶调国，居于今爪哇岛。引文中的“调便”，是梵文“天祐”的译音，系一种尊号，据传来自印度。这位派来的使节，名为师会，他成为印尼来华的第一位使者。《东观汉记》称：“（永建）六年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紫绶。”<sup>(5)</sup>从此，两国的交往不绝，逐步形成了两国间的友好贸易关系。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国 贸易关系的继续发展

东吴时，孙权曾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出使南海诸国，亲历和耳闻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如《南史》所征引：“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sup>(6)</sup>他们自然涉足印尼各古国。朱应的《扶南异物志》虽失传，康泰的《吴时外国传》却部分保存下来，其记载不仅翔实，尤为珍贵。《太平御览》引《外国传》，即描述了印尼的一些古国及其物产。该《外国传》

称：“从波辽国南去，乘船可三千里，到屈都乾国，土地有人民可二千余家……”<sup>(7)</sup>屈都乾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在今苏门答腊岛。该传并记载：“五马洲出鸡舌香”；“诸簿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sup>(8)</sup>五马洲，即马五洲，在今印尼马鲁古群岛一带，该地正是盛产香料。诸簿国，即今爪哇岛，其妇女善于织作。《太平御览》引《康泰扶南土俗》（可能是《吴时外国传》之部分）也记录了印尼的许多古国。“诸簿之东有五洲，出鸡舌香，树木多叶少实”，五洲，即前述之马五洲。“诸簿之西北有薄叹洲，土地出金，常以采金为业，转卖与诸贾人，易粮米杂物”，薄叹洲，指印尼廖内群岛一带的宾坦岛。

足见，三国时期，中国对印尼的主要岛屿，或有所见，或有所闻。印尼诸古国的一些热带产物，如玳瑁等，不断流入东吴。当时，远居北方的魏，不得不间接地同东吴换取这些奢侈品。《三国志》称：“魏使以马求易珠玕、翡翠、玳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sup>(9)</sup>

两晋时期，中国同南海诸国的往来不甚发达，“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但到南北朝时期，则出现活跃的局面，“及宋、齐至梁，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往往至矣”<sup>(10)</sup>。《梁书》进而称：“自梁革运……航海岁至，踰于前代矣。”<sup>(11)</sup>

整个南朝时期，印尼各古国，遣使携方物前来通好者达10次之多。详见下表<sup>(12)</sup>：

上述“遣使献方物”的交往形式，属官方贸易范围。印尼各古国对此采取积极态度。如何罗隋国在赞颂刘宋“四海流通，万国交会”的同时，要求“市易往反，不为禁闭”<sup>(13)</sup>。与此同时，商船贸易也比较活跃。南齐时，南海诸国（含印尼

古国名	今地	时间	遣使携方物
呵罗单国	苏门答腊岛	宋元嘉七年 (430年)	遣使献金钢指环赤鸚 鹞鸟、天竺国白蚕古 贝、叶波国古贝等
		宋元嘉十一年 (434年)	国王尸梨疏遮耶献银 涂料等
		宋元嘉二十九年 (452年)	遣长史鬻和沙弥献方 物
婆达国	苏门答腊北部	宋元嘉二十六年 (449年)	国王舍利不陵伽跋摩 遣使献方物
		同年	复遣使献方物
		宋元嘉二十八年 (451年)	遣使献方物
阇婆达国	爪哇岛	宋元嘉十二年 (435年)	国王师黎婆达陀呵罗 跋摩遣使奉表
干陀利国	苏门答腊岛巨 港一带	宋孝武世 (454—464年)	王释婆罗郁檮陀遣长 史竺留陀献金银宝器
		梁普通元年 (520年)	复遣使献方物

各古国)的商船不断航抵中国南部沿海一带,促进了交、广两州的繁荣。正如《南齐书》所述:“(南海诸国)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辏积王府。”<sup>(14)</sup>南北朝时期,正值佛教繁兴之际,东来西去的僧人,常常搭乘途经印尼各古国的商船,东晋名僧法显的东归,正是乘商船而行。据《佛国记》记载,从印度半岛至锡兰岛,“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尽夜十四日,到狮子国”;再乘商船返广州,“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泊九十余日至耶婆提国(今爪哇),“行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舶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又迂风漂泊经七十余日,至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今青岛)登陆。同书还引商人的话说,若在正常的情况下,从爪哇至广州,仅五十天便可到达。足见,当时广州同爪哇之间,已有频繁的商船往来。印度僧人求那跋摩,于宋文帝时(424—453年),应邀来中国传教,正是从诸薄港(居爪哇岛上)乘印度商人竺难的商船航抵广州的<sup>(15)</sup>。

### 三、唐宋时期两国贸易关系的蓬勃发展

唐宋时期,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造船、航海业的进步,以及对外采取积极交往的政策,同印尼各古国间的贸易关系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局面。

首先应当看到的是,中国航海业的进步和发展。自西汉以来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至唐代进入繁荣时期,成为中外交通贸易的主要渠道。陆上“丝绸之路”,因政局动荡,争

战迭起，加以耗费大、载量小、时间长，而逐步逊色。中国的远洋航行，已超越印度半岛，直航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并且首次抵达红海和东非水域。《新唐书》收录的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载录了这条航线的历程<sup>(16)</sup>。其中，佛逝国和诃陵国，正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上的古国，成为这条航线的重要历程。到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呈极盛之状，开辟了通向阿拉伯和东非的直达航线。改变了宋以前靠沿近海、逐级渐进、积而远致的情況。孙光圻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一书中，根据抵达地区的远近，将这条总航线归纳为六条航路。其中，便有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航路；广州（或泉州）至阇婆国航路<sup>(17)</sup>。足见，从唐宋间中国远洋航线来看，印尼各古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为唐宋间两国贸易关系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就官方贸易而论，此间印尼各古国遣使携方物来华者频仍。据《新、旧唐书》记载，室利佛逝国（居于苏门答腊岛）咸亨至开元间（670—741年），其王“数遣使者朝”。诃陵国（居于爪哇岛）于贞观十四年（640年），“遣使来朝”；大历中（始于766年），“使者三至”；元和八年（813年）和十三年（818年）以及大和、咸通年间，均“遣使来朝”。宋代的往来，更加频繁。宋称室利佛逝为三佛齐。据《宋史·三佛齐国》记载，自唐末天祐元年至南宋淳熙五年（904—1178年）的274年中，三佛齐使者前来唐宋两朝通好达26次，平均十年左右一次。若以建隆元年至大中祥符元年（960—1008年）的48年而论，通好达14次之多，平均三年多一次。因三佛齐来华通好的使者众多，以致宋朝政府采取“诏免赴阙，馆于泉州”的措施<sup>(18)</sup>。宋称诃陵国为阇婆国。《宋史·阇婆国》记载，阇婆国先后于淳化三年（992年）、大观三年（1109年），“遣

使人贡”。

这种官方贸易，成为当时贸易的主要形式。这是基于中国封建王朝和印尼各古国统治阶级垄断了海外贸易的缘故。从表面上看，这种形式似乎仅披上政治和外交的色彩，实质上却包含着贸易关系，即在“赠”与“答”之间，有其内在的价值相联系。据《宋史·三佛齐国》记载，宋元丰五年（1082年），三佛齐国公主用“唐字书”寄龙脑和布匹给广州提举市舶官孙迥，孙迥不敢收，向朝廷请示，其答复是：“令估直输之官，悉布帛以报”；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佛齐王悉利麻霞罗陀遣使来宋，并赠秦桧以真珠，不巧秦桧已死，朝廷命令“偿其直而收之”。这就是说，古代中国按照外来赠品的价值，估算出回赠品的种类和数量。因此，宋人评论这种形式时说，“不过利于互市赐予”<sup>(19)</sup>。西方史籍亦如此评论，“印度尼西亚的王族们不理采中国人怎样理解这种访问，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访问是唯一可能同中国进行买卖的方式”<sup>(20)</sup>。

如上所述，官方贸易的支付，显然是以易货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大量金、银和钱币的流出，并非作为交易的媒介，而是作为被交易的商货出现的。阇婆国于淳化三年（992年）遣使来华，当使者返回时，“赐金币甚厚，仍赐良马戎具”<sup>(21)</sup>。此外，当完成官方贸易活动之余，为表达友好情谊也往往输出金、银和钱币。三佛齐国于元丰元年（1078年），遣使来华，“（中国）念其道里遥远，每优赐遣归”。但到次年，又赐其钱6.4千缗，银1.05万两<sup>(22)</sup>。

唐宋间，通过官方贸易渠道，中国同印尼各岛互通有无的商货，品种繁多。中国输入苏门答腊的有：金、银、瓷器、锦绫、缣绢、钱币、银器、间金涂银带、浑金带、锦线

簪、僧紫衣、白牦牛尾、师号牒、钟、糖、铁、酒、米、乾良姜、大黄、樟脑等。输入爪哇岛的有：五色缣绢、皂綾、青白瓷器、夹杂金银、金银器皿、漆器、川芎、白芷、硃砂、绿矾、鹏砂、砒霜、良马、良马戎具、铁鼎等。自苏门答腊岛输入中国的有：象牙、犀角、真珠、白金、龙脑、婆律熏陆香、乳香、蔷薇水、水晶、水晶指环、水晶佛、梵夹经、金字表、锦布、火油、琉璃瓶、珊瑚树、万年枣、扁桃、白沙糖等。自爪哇岛输入的有：胡椒、象牙、真珠、玳瑁、龙脑、丁香、檀香、绣花销金、绣丝绞、杂色丝绞、吉贝织杂色绞布、玳瑁槟榔盘、藤织花簾、犀装剑、金银装剑、七宝饰檀香亭子、白鸚鵡、五色鸚鵡、频伽鸟等。以上是根据《新·旧唐书》、《宋史》有关《外国传》和《诸蕃志》等史籍而列，是翔实可信的。其输入品种，除去相同的不计外，输入中国的，共有34种，自中国输出的，共有34种。不仅品种扩大，且实用性也增强。在进口商货中，除高档奢侈品、观赏动物和香料的一部分专供封建王朝奢侈需要外，其余绝大部分具有实用价值。以奢侈兼实用品的香料、精细装饰品和棉、丝织品的品种为最多。在出口商货中，手工业品和具有实用价值的占绝大多数，其中，以丝织品的品种为最多。

与此同时，商船贸易也十分活跃。南海诸国的商船，不断驶入中国。唐《国史补》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sup>(23)</sup>南海舶，虽未指明是哪些国家，但印尼各古国在其内，是无疑的。唐代名僧义净西去求法取经，途经室利佛逝，乘的是波斯商船，“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于公元689年东归时，亦在室利佛逝乘商船而往，“于时商人风便举帆高张，遂被载来……”因佛经尚在室利佛逝存放，又于



同年11月，偕同贞固等僧人，复乘商舶，前往取经，“附商舶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长驱”<sup>(24)</sup>。除义净外，唐代还有许多僧人也是循海路西去取经的，他们绝大多数途经室利佛逝和诃陵等国。其乘坐的船只，也多为商船。

宋代，印尼商船往来尤甚。三佛齐国装载乳香的商船，常常扬帆而来<sup>(25)</sup>。据《宋史·三佛齐国》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潮州上言道：“三佛齐国蕃商李甫海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雍熙二年（985年），三佛齐“舶主金花茶以方物来献”；熙宁十年（1077年），三佛齐大首领兼大海商地华迦罗也航抵中国。宋代的广州，随时可见三佛齐国和阇婆国的商船。《师吴堂记》载称：“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尙不能计。”<sup>(26)</sup>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三佛齐作为中国和西方各国的中泊港，对促进中西方海上贸易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佛齐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显要，“诸番水道之要冲”<sup>(27)</sup>，“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sup>(28)</sup>。它利用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转贩中西方商货，并成为中西方商货的集散地。《诸蕃志·三佛齐国》载称：“外有真珠、乳香、蔷薇水、梔子花、腊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猫儿睛、琥珀、番布、番剑等，皆大食诸番所产，萃于本国。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锦绫缣绢、糖、铁、酒、米、乾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正因如此，三佛齐成为中国商船西去和西方商船东来的必经之地。正如《萍州可谈》卷二所引：“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远贾辐凑，故号最盛。”《岭外代答·三佛齐国》亦称：“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阿拉伯）、故